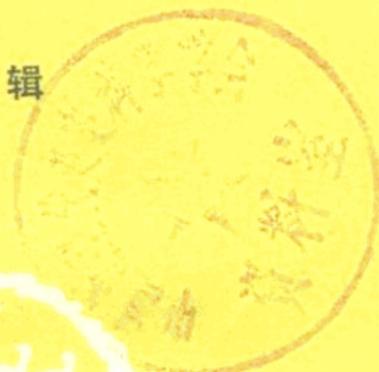


10.12

無錫文史資料

第 24 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江蘇省無錫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目 录

从小女工到大学生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李霞影（1）

回忆严父的慈爱…………………钱 易（5）

我的伯父钱穆…………………钱慈明（11）

蓉城从钱师学习回忆片断…………洪德辉（18）

钱宾四先生在后宅…………邹景衡（25）

宾四师二三事…………吴沛澜（30）

钱穆先生年表…………顾一群编（34）

近代爱国科学家徐建寅…………包正义（47）

清末科学家徐建寅与福州船政…………徐 泓（51）

徐寿徐建寅生平历史纪年…………王国忠编（55）

我的良师益友…………………冯和法（77）

杨荫浏与基督教圣诗………………王神荫（93）

无锡奇女子秦森源………………秦寅源（104）

回忆我的舅父施之勉………………唐原道（111）

回忆祖父龚锡春、父亲龚士英…………龚国梁 龚丽娟（123）

忆前无锡普仁医院美籍院长李克乐

- 博士 孙保垣 (129)
杨楚孙及其诗集 邹缔绵 (138)
诸健秋传略 邹坚之 (140)
师门旧事 吴雨苍 (152)
《健秋画存》序 钱基博 (161)

关于《钱孙卿与无锡县商会》的补充意见

- 钱钟汉 (163)
九丰面粉厂创办经过 李志霖 (187)
返国后所作科研工作的回顾 胡汝禧 (193)

- 孙君毅与无锡《邮友》 辛道国 (196)
《青年新闻》——抗战前的一张周刊 孙翔凤 (204)
从舞台的变迁看锡剧的发展 季梅芳 (207)
光华小学与乙种实业学校 方永施 (216)
方永施先生简介 朱龙湛 (223)
辞书编纂在无锡师范 姚方勉 (225)

近现代无锡籍知名人士选录 (233)

来函照登

市佛教协会来信 (92) 杨嘉谷来信 (10)

顾子春来信 (295)

从小女工到大学生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

李 霞 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也是我入党41周年。解放后，我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当车小女工成长为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高级工程师。现在由于党的事业需要，我又当了纺织工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回想我的成长过程，无一不是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我衷心体会到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中国共产党真正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前，我们女工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每天工作12小时，真是从鸟叫做到鬼叫，冬天上日班，整天见不到太阳，夏天在高温下工作，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人们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精力再进行学习和其它工作。工作这样艰辛，生活却无保障，物价飞涨，拿一期工资只能买二到三斗米，如果动作慢些，只能买几条肥皂。工人中有三个怕：一怕生病；二怕生孩子；三怕年纪大。遇到这些，就会被资本家开除。

无锡解放不久，我就参加了青年团，1950年，我又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我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五十年代初，在党、团、工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我发动和团结全组38位工人同志，响应马恒昌、郝建秀等先进小组向全国发出的挑战，开展了劳动竞赛，并向苏南区的工人同志发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挑战书，接着苏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当时江苏省还未成立）。1952年，我作为劳模代表，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53年，我们小组——“李霞影小组”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模范小组。同年5月，我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当选了无锡市和江苏省的人民代表。1954年，党又选送我去南京工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读书，1958年速中毕业后又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系深造。经过八年的苦读，我于1962年毕业。

回想起我刚进南工速中学习时，一开始就碰到不少困难，上课时听了顾不得写，写了顾不得听，解一道题要花老半天。我自知基础不如人家，只能用勤奋来弥补这一不足。所以每当人家休息时，我还在复习或者在做习题。领导上知道我困难，就派学习好的同学和我坐在一起，学校的校长、书记及其它领导也经常鼓励我：“你在生产上善于克服困难，找关键，在学习上也应当如此”。在老师的指导和同学们的帮助下，经过一学年的苦读，学习情况逐步好转。到了第三学年，我被评上了优秀生。在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学

习时，我被编在“青工八一班”。这个班级是党为了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培养而特意开设的。在这个班级里学习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有青岛的郝建秀，河南的李秀英等共30位同志。学习生活很紧张。画法几何变成“头痛几何”。我的立体概念差，学起来特别吃力，我就多观察实物和模型，多测绘另件，同时多请教老师和同学，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最后机械制图也达到了优良的成绩。我们的班级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郝建秀同志是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她把全班同学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针对我们班的特点，她带头提出了不让一个同学掉队的口号。我当时担任了党小组组长和学习小组组长，郝建秀同志就在我的组里，在学习上和生活上我们经常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经过老师的辛勤教育、同学们的相互帮助，我终于战胜了学习上的种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连续三年被全班同学评为优秀生，得到了学校的嘉奖。在毕业设计时，我承接了五万纱锭规模的纺织厂的设计任务。毕业答辩时，学院聘请了上海市著名的纺织专家、学者、教授和毕业生的代表共二、三十人来给我们提问和评定成绩，气氛隆重而严肃。开始时我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我一一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最后评定我成绩优良。

1962年9月24日，我参加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纺织工业部领导发来了贺电：祝贺我们胜利完成学业任务，光荣毕业。上海电影制片厂特地来拍摄电影，华纺的温仰春院长

亲自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记者来采访我们，摄影记者的镜头都瞄准我们。当时我内心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也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光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29年了，昔日的青年，如今已年过半百。当年的同学，都已成为纺织和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党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正确啊！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在我国的纺织高教事业中，为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纺织管理人才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回忆严父的慈爱

钱 易

我从孩提时代就与父亲分离，再见面时已过不惑之年。父亲很严肃，即使我们相见时间很短，即使子女们头发已见花白，父亲也常有责备和教训。但父亲又是多么慈爱。他的慈爱使我曾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下来；他的慈爱使早为人母的我又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他的慈爱更使我自惭，作为女儿，我对父亲的侍奉和孝顺实在是太少太少。

记得1981年在香港与父亲久别后第一次重逢，父亲关切地问及我家中的每个人，要我告诉他我们兄妹五人的经历、生活、脾性、家庭。听我说及几位嫂嫂都很贤慧，能很好照料丈夫、子女，他欣慰地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知道十个孙儿女都聪明好学，考上了重点大学、重点中学，他更是眉开眼笑。谈起曾有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感叹，并说：“吃些苦没什么，我只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尽到责任，尤其是小女儿，总觉得对她惭愧。”父亲对子女、亲人、民族、国家的深沉的爱溢于言表，使我永难忘怀。

当时蒙香港中文大学马临校长和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的

关照，父母亲、伟长堂兄和我住在中文大学宾馆，楼上三间卧室，楼下客厅和饭厅，只供我们一家使用。我曾对父亲说：“在这里真像过家庭生活一样。”父亲先说：“你觉得开心就好。”接着沉吟半晌，又说：“这里怎么能和家相比？什么时候你能到我台北家中住一阵就好了。”

父亲的这个愿望在我心里生了根。1981年至1983年，我在美国工作了两年，曾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台北探望父亲，终因障碍重重，未能实现。1984年，父亲九十大庆，我们也仍只能到香港向父亲拜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等待了七年多。1988年，我在荷兰工作，听说父亲病重，两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进食，甚至话都很少说，真是心焦如焚。11月初终于得到了获准入台的消息。当我真的飞越了阻隔骨肉同胞四十载的海峡，踏进父亲生活了二十年的素书楼时。我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记得我直奔二楼，一下扑倒在坐在走廊中藤椅上的父亲面前，叫道：“爸爸！女儿来了！女儿看望您来了！”父亲满脸笑容，拉起我的手抚摸着，连声说：“好！好！你终于来了！”当晚，父亲破例走下楼与家人一起用晚餐，饭后又与我谈了许久，他问我一大串问题：你是不是从欧洲来？为什么到欧洲去？北京的两家怎样？苏州的两家怎样？……谈话中一直拉着我的手。啊，父亲的手多么柔软，他的抚摸又是多么深情啊！

我在台一个月，父亲的胃口一天好似一天，精神也日渐恢复。父亲又开始在走廊中散步，最喜欢有客人来访并在一

起谈今论古，我常给父亲读报读文章，父亲还爱听电视新闻。在我到台北的第七天，父亲突然要我为他准备纸笔，然后伏案写作起来。以后又写了好几次，有时一口气可写两个小时，得十来页文字。我又惊又喜，久久地注视着书桌前的父亲。他一会儿深埋着头，下笔的手用劲大，动作快；一会儿又抬起头来，眼光凝聚在远方，完全入了神，浑然不觉周围事物。我在心头低声呼唤：父亲，我今天才看到了您在素书楼的真正生活，我今天才明白了您为几十部著作难以计数的文章、讲稿所付出的心血。您至今仍是思潮汹涌，文笔不衰，您还不老，您的日子还很长很长。

这段日子里，我们父女谈家常的时间更多。父亲能清楚地描述家乡七房桥的旧宅，更喜欢和我一起回忆在苏州度过的时光，那里的旧房虽小，却是他完成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的早期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的地方。书房外有一小花园，池塘假山俱全，正是散步休息的好处所。父亲关心地问及这些房子的近况，默然地说：“看来我是回不去了。”我听了心酸，安慰他说：“好好保养身体，父亲是能够回去的。”父亲告诉我，当年他在江南大学执教期间，常爱驾小舟在太湖荡漾，“那才是人间最惬意的事啊！”一脸喜悦，心向神往，我也仿佛随他重游了太湖的绮丽风光。有一次，父母陪我去游阳明山，父亲远望着层层叠叠的山景，又一次对我谈起他当年游览泰山、庐山的情形。父亲告诉我，他登泰山时，学生们曾为他租了轿子，他却一口气自己爬上了山顶。

又谈及曾在庐山住过几夜，结识了一位老和尚……。听着父亲动情的追忆，我不禁想，谁说父亲远离故土、不爱祖国？父亲的心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为之奋斗了毕生的故土山河，他对祖国的爱又是多么具体、深沉！

最有意思的是，父亲总把我看成“小孩”。他常常问我：“你今年几岁了？”听到回答后又总是大吃一惊“喔？！”这样的回答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父亲常爱一声不出地旁听我和客人的谈话，夜晚他会告诉继母：“我的女儿很懂事的，她长大了！”父亲见我总在家陪伴他，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不出去玩玩呀？”可是，他夜间从睡梦中醒来又常要问身边的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听说我在睡觉，他不满地嘀咕：“她怎么老要睡觉？”曾有几晚，我睡在他卧室里陪伴他，当我听到稍有动静立即翻身下床上前侍候时，父亲总是抚摸着我的手臂说：“快去睡，别着了凉。”有一次，我为父亲洗澡擦背，他连声说：“好舒服啊！这是我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我不禁泪水盈眶，喉头哽咽。父亲，不是女儿不孝，是女儿力不从心啊！

可恨的是即使这样短暂难得的天伦团聚，也被某些人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时台北报纸上连日刊登对我的猜疑、指责和控告，甚至还有人控告父亲“知匪不报”。家中电话铃声、门铃声终日不绝，连吃饭也不得安宁。父亲虽然耳失听、眼不明，却很清楚有人不怀好意。他几次生气地说：“他们究竟要把你怎么样？”又感叹不尽：“这些人已

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最终还是父亲作出决定，让我提前两天离台。我离开台北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在花园里摄影留念，父亲一直振作着精神，随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场景，照了一张又一张，脸上还强露出笑容。但到晚饭后，我向父亲鞠躬道别时，他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竟不对我说一句话。我想对父亲说的话是那么多，但当时一开口就泣不成声。迈出素书楼，我默默地在心底对父亲说：我还会来看望您的，我的兄妹们也会来的，您老人家的十个孙儿女都在盼望着见到您。我对于父亲的健康，对于我国的天伦乐和团圆梦，对于海峡两岸的沟通，所怀的希望和信心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我与父亲的永别。

这令人悲伤的日子来得实在太早太突然了。曾几何时，从台湾来的朋友们还对我说，父亲搬进新居后，曾告诉来访亲友：“这间屋子是留给我女儿住的。”父亲啊！您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多少个夜晚我辗转床侧，我开始明白，父亲这一辈子等待的东西太多，等待的日子太长了。父亲累了，要安息了。父亲，我多么想再多看几眼您那严肃而又慈爱的面容，我多么想再多陪伴您几夜，我正努力冲破障碍，我要再一次飞越那仍然阻隔着我们的海峡。假如万一我做不到，那又是因为我力不从心，我只能请求父亲的谅解。我也要告诉您，您的子女孙辈都会永远怀念您。您的治学精神、您的不

朽著作、您的严肃教诲、您的无尽慈爱，那是您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会永远珍藏！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作者为钱穆先生的长女，现任北京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杨嘉谷来信

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物料第16辑载“无锡粮食堆栈业简史”在97页附表二最末一项“元益堆栈负责人陶锡侯创办于1930年”，变迁情况栏“洪源一乾元一元益”。事实是元益堆栈前身乾元堆栈，乾元堆栈前身洪源堆栈。陶锡侯买下洪源栈，改名乾元栈，栈主当然陶锡侯无疑。后聘张毓麟为经理，1929年时笔者已在该栈供职共事。不料栈主陶锡侯患病逝去，遗下七子五女，丧后家属议定，改组乾元栈为“元益堆栈”，由陶长子陶君武为负责人。请予更正。

杨嘉谷

我的伯父钱穆

钱 慈 明

—

电讯中传来二伯父钱穆在台北逝世的噩耗，我不禁潸然泪下。原想在他生前能再睹慈颜，更盼望他能回到他已离别四十多年的故乡，以慰他思乡之苦。谁知这愿望再也不能成为现实。

二伯父在他逝世前不忘祖国统一，并致力于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1986年，他曾在台湾《联合月刊》上发表题为《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指出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

在此以前，1982年3月他曾与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同时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进行学术交流。

1985年，他91岁，撰写《师友杂忆》，深深怀念昔日师友间的友谊，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诚挚的感情。

1987年，他在执教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上最后一堂课，告别学生时，谆谆嘱咐：“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

了中国。”

1988年11月，我的堂妹、清华大学派往荷兰的访问学者钱易，从荷兰赶赴台北探亲，父女相会，伯父“兴奋得象个孩子，眼睛也亮了”。他的思亲、思乡之情多么浓郁啊！

我在伤感之中，回忆起一些往事，小时候我常听得祖母讲，二伯父17岁就去秦家村小学任教员了，和大伯父一同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二伯父自幼聪明好学，在荡口果育学校读书时，成绩优异，作文特佳，曾两次跳级。在中学时各门功课都非常好，凭成绩完全可以考上大学。但因祖父去世后，全家生活靠大伯父一人的微薄薪金难以维持，就去做小学教员，补贴家用。我父亲和叔父就是由大伯父、二伯父抚养资助，才在常州中学堂毕业的。

二伯父对祖母十分孝顺，不管情况怎样，总是想方设法地照顾好祖母。大伯父去世后，二伯父去苏州任教，不久就把祖母接到苏州一起生活。

1930年，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聘请二伯父去北京执教。同年，二伯父全家从苏州迁往北京，祖母也同去。二伯父特地租住了一所较为宽大的住所，让祖母住得舒适一些，逐步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

不久，因榆关（山海关）事件，北京风声日紧，二伯父恐政局动荡，就把祖母送回荡口老家暂住，准备局势平静后，再接祖母回北京同住。可是，祖母认为无锡老家气候好，自己年纪又大了，执意不回北京了。二伯父看祖母态度

坚决，就让叔父从北京调回荡口工作，照料祖母日常起居生活。同时还赶到城中我家，嘱我父母亲要经常去乡下探望祖母。当时我读小学四年级，二伯父特地让我学习写信，叫我每月写两封信给祖母，报告我学习、生活和家中情况，以使祖母得到精神安慰。

祖母70寿辰那年，二伯父特地从北京赶回来祝寿。尽管祖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二伯父还是陪同祖母从荡口乡下到城里医院作了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那天，还邀我父亲和我，以及二伯父的好友施之勉和施之勉的儿子同游鼋头渚。我们在宝界桥北面山上的雪浪茶室喝茶。宝界桥如长虹飞渡，渔舟点点，松涛阵阵。我们同在茶室里忆往事、谈时局，直到很晚才回城。

抗战开始后，二伯父全家从北京搬回二伯母的家乡苏州，二伯父又把祖母从荡口接到苏州同住，自己隐姓埋名，杜门不出，侍候祖母一年。直到1940年，二伯父去四川讲学，才离开了祖母。

祖母早年有严重的胃病，有次胃病大发作，二伯父特地写信给友人丁福保，请求帮助诊治。丁福保是著名辞书学家，也深谙医道。他应二伯父的请求，治愈了祖母的胃病。

祖母去世时，二伯父因远在四川，无锡又是沦陷区，不能回无锡治丧。为了悼念祖母，便把自己的书室改名为“思亲强学斋”。此事，在他《八十忆双亲》一文中作了深情的

回忆。

二伯父不仅对祖母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对我们侄儿辈也非常关心。我幼年时，常生病发烧，体质较差。家境又清寒，吃点炖蛋就算开荤了。二伯父时常叮嘱我父母，要给我增加营养，并设法帮助我们。如他去城里时，经常买些鱼肝油带回荡口给我服用。

大伯父去世时，堂姐钱施秀、堂兄钱伟长尚未成年。二伯父去苏州执教时，就把他姐弟俩带去苏州读中学。二伯父去北京讲学时，又携钱伟长同往，后来，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

诸祖耿先生在《怀念钱宾四先生》文中说，二伯父“平生孝于亲，友于兄弟”，确实如此。也许，正是这种对母亲、对兄弟的诚挚深厚的感情，使得二伯父始终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

二

1946年，我从染织专科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想考大学，但当时的学费昂贵，家境清贫，负担困难，再则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也不放我到外地去读书。故我父亲给我在锡南沈氏小学找了个教书工作，我心中却很彷徨苦恼。

正在此时，二伯父回苏州家中度假，我父亲和我去探望他。二伯父很随和地问我几个问题，就洞察我心中的矛盾。针对我的情况，他说他自己就是小学教师出身，主要靠自学钻